

中國出版界簡史

楊壽清



永祥印書官舍刊

贈



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初版

不版權所有印翻

范泉主編  
青年知識文庫

- |  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   |
|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|
| 第<br>三<br>元<br>世<br>紀<br>文<br>化<br>傳<br>播<br>共<br>十<br>集 | 談<br>文<br>人<br>物<br>語<br>流<br>行<br>話<br>方<br>君<br>產<br>出<br>版<br>文<br>化 | 人<br>吳<br>鴻<br>爲<br>註<br>朱<br>志<br>泰 | 經濟學<br>人<br>吳<br>鴻<br>爲<br>註<br>朱<br>志<br>泰 | 經濟學<br>人<br>吳<br>鴻<br>爲<br>註<br>朱<br>志<br>泰 |
| 中<br>國<br>出<br>版<br>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中<br>國<br>出<br>版<br>史   | 中<br>國<br>出<br>版<br>史                | 中<br>國<br>出<br>版<br>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中<br>國<br>出<br>版<br>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藝<br>術   | 藝<br>術  | 藝<br>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藝<br>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藝<br>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西洋近代美術史  | 蘇聯的集體農場   | 民主主義概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新代物質文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近代物質文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錢君甸  | 沈子洋   | 沈錦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吳滄  | 吳滄  |

中國出版界簡史

楊壽清著

陳安發  
人鎖

永祥印行者  
上海路三八號

永祥印行者  
上海陝西南路八三二號

# 中國出版界簡史 目次

一 古代中國的出版業	(一)
弁言	(一)
古代中國的書肆和雕版	(二)
傳教事業與西書的譯述	(三)
最早中國報紙	(四)
新興書局與商務印書館	(五)
日文書的翻譯	(六)
中華民國與中華書局	(七)
二 五·四時代出版界的發展	(二五)

「新青年」與新文化運動 ······ (二九)

「五·四」以後出版界的新氣象 ······ (三〇)

「五·卅」時代左翼文化的活躍 ······ (三一)

文化政策與「萬有文庫」 ······ (三二)

三  
一·二八後出版界的傾向 ······ (三三)

申報館的出版事業 ······ (三四)

出版界的復興與「雜誌年」 ······ (三五)

從小書到大書 ······ (三六)

附：對於中國出版界之批判與希望 ······ (三七)

## 一 古代中國的出版業

### 弁 言

中國的出版事業發達最早，於漢代已有書肆，至隋唐之季已有木版印刷。降至宋代，雕板術尤盛，宋版書至今尚有保存者，其刊刻之精，令人驚嘆。於北宋時，更發明膠泥活字，較之歐洲活字印刷之創自十五世紀中葉者，要早四、五百年。惟其後出版事業進展甚緩，直到清季，因歐美傳教師來華傳教，加以清廷迫於外侮，欲謀改革，於是西洋印刷術以及思想學說，逐一傳入中國。迨民國成立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，中國的出版界更有突飛猛晉之勢。後因一二八戰事發生，一度衰微，但不久即告復興。但至中日事變以後，因長期戰亂，使出版業一蹶不振。據此中國的出版界大致可分爲四個階段：在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五四運動以前，可稱爲漸進的階段；自此以

後，開始進入飛躍的階段；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一二八後，為波動轉向的階段；迨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，抗日戰爭發生，因戰亂延長，日寇進侵，中國出版界的重心，乃隨國軍向後方撤退，業務分散，是可謂為亂離時代。

茲將此四個階段中中國出版界的概況，分為四篇記述之。惟因作者手頭材料不多，一部份且係憑藉記憶，故所記難免闕陋。自抗戰發生以後，中國出版界的變化最大，但以材料散佚，搜集廢時，暫時復闕，容後補敘。

### 古代中國的書肆和雕版

中國古時的書籍，最初係將文字刻於木板或竹簡上，而用韋（柔皮）編連起來。到了秦時，墨與筆已先後發明，乃改書於帛，稱為縑素。其後又發明紙張，於是凡有著述，多賴輾轉抄錄而流傳。至漢代始有書肆，楊雄（B. C. 59—A. D. 18）所著「法言」，吾子有云：「好書而不要諸仲尼，書肆也。」據考這是「書肆」兩字見

於載籍之始。又「後漢書」王充（紀元初年時人）傳：「常游洛陽市肆，閱所賣書，一見輒能誦憶。」又劉梁傳：「梁宗室子孫，而少孤貧，賣書於市以自資。」這都是在漢時已有書肆的明證。但當時的書籍多係鈔本，尙談不到出版。

迨西曆五九三年隋文帝時，始有雕版刻經的事。至唐末（約西曆九〇〇年前後），復有「墨版」，多印術數小學字書。唐柳玭家訓序言有云：「在蜀時常閱書肆鬻字書，小學率雕本。」可見唐時已有雕版書，但經五季兵亂後，已悉化為灰燼。至西曆九三二年後唐明宗時，宰相馮道、李愚請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；自此雕版術漸盛，官書家刻，同時並作木版印書既多，於是專以賣買書籍為業的書肆益盛。其時尤以吳蜀兩地，可說是中國文化的中心，試觀馮道、李愚奏稱：「吳蜀之人，鬻印板文字，色類絕多。」語可知。

到了宋仁宗慶曆年中（約一〇四五年前後），復有布衣畢昇，發明膠泥活字和木質活字的印刷術。而宋代的坊刻，則有書林、書堂、書棚、書舖等名稱。前有建安余

氏，後有臨安陳氏，最爲著名。此外有建寧之黃三八郎書舖，臨安之尹家書籍舖，閩山阮仲猷之種德堂，西蜀之崔氏書舖，咸陽之書隱齋，建陽之麻沙書坊，汾陽之博濟堂等。而建安余氏的勤有堂，肇始於唐，至明末未替。臨安陳氏的書棚本，初爲陳道人書籍舖刊行者，繼爲陳解元書籍舖刊行者，亦相傳數世，爲藏書家所珍異。

至元時（一二七七—一三六七），又有王楨發明瓦質活字的印書法。而坊刻之見諸傳本者，則約有四十家，其中建安虞氏的務本書堂，鄭氏的宗文書堂，楊氏的清江書堂，均自元迄明，數世不替，成鼎足屹峙之勢。金源分割中原，平水地當要衝，爲書賈所萃。其時吳越閩書肆亦多，較著者有杭州劉世榮的勤德堂，董氏翠巖精舍，劉氏日新堂等。明代坊刻之書，視宋元爲尤多，而以燕京、江浙爲盛。胡應麟云：「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：燕京也，金陵也，閩閩也，臨安也。閩楚滇黔，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，則余時友其人。」可見其時書肆的分佈，已經遍於中國了。

降至明代（一三六六—一六四三），有無錫人華文輝（燧）發明銅質活字，

字體堅固，印刷術益爲進步。至清代（一六四四—一九一）刻書更多。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），詔刻「四庫全書」中善本，侍郎金簡請刻棗木活字套版一份，排印，印成之版本，稱爲「武英殿聚珍版」。但抄錄之風，仍不少衰，例如自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）開始，歷十年而成的「四庫全書」便是。命「四庫全書館」的館臣選擇而繕錄的。至當時的坊刻，則以江南爲盛。王漁洋云：「近時金陵蘇杭書坊，刻板盛行，建本不過蜀、蜀、京師（北平）亦鮮佳手。葉德輝亦云：『按文館（漁洋）不烈、顧廣圻、阮元等校刻之書，亦多出金陵書。』劉文、金文楷之手，而寄寓吳中的書，賈錢聽默，設一肆於市曰萃古齋，素精鑒賞，故所羅致，多係珍本。蘇州席氏的掃葉山房，刻書最佳，尤爲著名，迄今尚存。

出版事業與文化產品有相輔相成的關係。因文化產品日衆，於是促成出版事業的興起；而出版事業發達，復促致文化產品的旺盛。中國的國粹文化，因社會生活

的改變，思想觀念的演進，和表現方法的進步，而致新產品日積月累；迨至後漢明帝時代以後（西曆六五年以後），西域文化輸入，佛經譯述日盛，而使中國文化的內容益為豐富。於是，舊時藉抄錄以為傳播與搜集文化產品的手段，到後來顯為時間與精力所不許，因乃有印刷術的發明。

### 傳教事業與西書的譯述

至明神宗萬曆年後（一五八〇年以後），以意大利人利瑪竇來華傳教，與徐光啓合譯天文數學書籍為始，西洋文化漸次介紹到了中國。但當時所譯多係曆數、格知、天文、農藝、傳道等書。清初（一六四四年後）時，因滿人不注重學術，譯書之風不若明季之盛。後因來華傳教的英人為印刷聖經，乃於嘉慶十年（一八〇五）以後，傳入了歐式活字的印刷術，雕刻華文字模，至嘉慶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）印成了第一部華文「新舊約聖經」。嗣後美人法人相繼研究華文活字，至道光十八年

(一八三八)成立「皇家印刷事務所」與「在華聖教書房」專印教會方面的宣傳文字，以及少數供給教會學校學生用的西學譯書與工具書。自是，鉛印術始漸盛行。但在中國人方面，則仍墨守成法，不知利用機械，故以新印刷術從事出版事業者尙不多見。

清道光二十年(一八四〇)鴉片戰爭發生，結果中國戰敗，至道光二十三年(一八四三)訂立了南京條約，自此西人來華居住者日衆。至道光末年(一八五〇)太平軍起事，陷金陵，迫直隸，其後清廷藉西人義勇軍的力量，始於同治三年(一八六四)平定。在此期間，又發生了兩次英法聯軍之役：第一次發生於咸豐七八年間(一八五七—五八)，陷廣東與大沽，結果訂立了天津和約；第二次發生於咸豐十年(一八六〇)陷北京，結果訂立了天津續約。至此，清室因惶於西人的船堅砲利，始有志於徵收西學，於同治(一八六六)設「江南製造局」於上海，翌年又設「同文館」於北京，其後並派遣學生留學英法各國。江南製造局中設有「翻譯

館，」所譯關於軍事、航海、工程、科學、實業，旁及史地、政治、法律、時論等，其計有六百七十九本，多係由外國人口述，而由中國人鄭昌桂、趙元益、徐建寅、華寅等譯述的。同文館則作育專門的譯書人才，嘗出版「日本雜事詩」，後於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歸併於「京師大學堂」，該「學堂」為民國時成立之「北京大學」的前身，而「北京大學」則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。至於留學歐美的學生，於回國以後，因未能在政治上發展其抱負，乃多從事於譯述，以介紹西洋的學術文藝。所以這三件事情，對於中國出版界的影響很大。

### 最早的中國報紙

我國古無報紙，雖宋代有「朝報」，前清有「京報」，但僅記載皇帝的上諭和臣子的奏章，未見新聞的效用。至於民間，因當時在專制政體之下，中國的士大夫均懼構成文字之禍，都不敢辦報，以宣洩民意。但自鴉片戰爭之後，僑居上海的外人漸衆，需

有交換意見、報告消息的機關，乃於清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）英僑奚爾門（H. Shearman）在上海創辦「北華捷報週刊」（North China Herald. Weekly）。咸豐六年（一八五六）奚爾門逝世，至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由英人壁克伍特（Edwin Pickwood）經營，因新聞資料增多，於是另出「航務商業日報」（Daily Shipping wist and Commercial New），至同治三年始改名為「字林西報」（North China Daily News），而以「北華捷報」為附屬週刊。該報在遠東係代表英國，而在上海則代表前公共租界與英僑的利益而發言，至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始告停刊。

前清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）路透社（Renter News Agency）在上海設立機關，一方面蒐集中國方面的新聞以供給其總部，一方面則以國外的消息供給「字林西報」，是為中國有通訊社之始。至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該社始發華文通訊稿，其餘在華的通訊社，則都係設於民國以後。

「北華捷報」另有華文版「上海新報」創刊於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二），可說是中國最早發行的正式華文報。至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），任渥經營進出口，開設美食洋行的英人美查（Ernest Major），延青浦席子眉爲買辦（即經理），創辦「申報」，上海新報至一八八二年，改爲「滬報」，不久即歸消滅，於是「申報」遂爲中國最老的華文新聞機關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，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，最初加以利用者爲天主教會設於上海徐家匯土山灣的印刷所，申報館則附設「點石齋石印書局」，印刷「聖諭詳解」，繼印「康熙字典」，因字跡清鮮，故銷行極廣，從此石印術逐漸風行，於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二）有「同文書局」和「拜石山房」等專門的石印書店成立，而在武昌、蘇州、廣州等地，也相繼開設石印書店。至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，美查爲收回股本以謀歸國，乃添招外股，將「申報」及其附屬事業改組爲公司。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，席子眉出資購得申報館全部產業，於是主權始入華人之手。子眉逝世後，由其弟子佩繼續主辦。至民國元年（一

九一二，史量才氏復向席氏購得該報館，後經史氏二十餘年的擘劃經營，遂造成今日的地位。

席子佩將申報讓盤於史量才後，曾悔約涉訟，但當庭敗訴，乃復獨力創辦「新申報」與「申報」競爭，於初發行時頗露鋒芒，後因廣告收入有限，月有虧蝕，折閱不貲，駢至奄奄無生氣。於民國十三年讓渡於孫傳芳，為軍閥之宣傳機關。至民國十五年北伐軍抵滬後，始遭封閉。

與「申報」有同等地位的「新聞報」，係初刊於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，初為中外商人合組公司，推英人丹福士為總董，公司後漸解體，丹福士遂獨為主人。旋丹福士以經濟破產，終為美人福開森（John Ferguson）於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出資購得，至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復改組為有限公司，以福開森為總董。直至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，福開森無意繼續經營，乃將其所有大部份股權讓交於中國銀行團（以金城銀行總理吳任章及四行儲蓄會協理錢永銘為主

腦，）於翌年交割，改任吳在章爲總董，於是新聞報的管理權完全歸於中國人，而改組爲華商股份有限公司。該報因經營得法，故其創辦雖較申報凡遲二十年，但其聲譽則與申報不相上下，物質設備與申報並駕齊驅。

此外，尙有英人管理，於一八七四、七五年間陸續創辦「匯報」「彙報」及「益報」等，但完全華人自辦之報紙，則係在一「甲午之役」清廷慘敗之後。

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「甲午之役」清軍戰敗，康（有爲）梁（啓超）的變法維新主張乘機蹶起；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也在這時開始。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五），康梁的同志在北京推張之洞爲會長，設立了「強學會」，附設「強學書局」，發行報紙「中外紀聞」，用木板雕刻印行，日出一冊，由舊京報人隨「宮門鈔」分送諸官宅；上海「強學會」則發行「強學報」，用鉛字排印，日出一小冊，亦不取費。但不久該會被封，於是該二報同歸消滅。但在上海的梁啓超等，則復於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（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一日）發行「時務報」，由汪康年

爲經理，梁啓超爲主筆，鼓吹新法，風行一時。嗣汪康年復邀同大鈞、曾廣銓等，別出「時務日報」，於一八九八年五月五日（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五日）創刊，記載中外大事，評論時政得失，分欄編輯，用報紙兩面印刷，始樹立了現代新聞報之體裁格局。至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六日（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八日），清廷諭「時務報」改爲官辦，「時務日報」則於八月十七日（七月一日）起易名「中外日報」，至一九一一年春（前清宣統三年）始歸消滅。

同時，章炳麟等亦於一八九六年在杭州發刊「經世報」，嚴復等於同年在天津發刊「國聞報」，翌年（光緒二十三年），胡璋在上海創辦「蘇報」，當初該報內容無聊，絕無特色，後於一九〇〇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）出售於陳範，所延主筆，有吳敬恆（稚暉）、汪文溥（蘭皋）、章士釗（行嚴）等，鼓吹種族革命，立論激烈，嘗因出版鄒容所著「革命論」一書，有章炳麟作序，而致引起文字之獄，章炳麟被判監禁三年，期滿後逐出租界之外，鄒容被判監禁二年，而終死於獄中，「蘇報」則於